

训诂学的特性与现代化

○ 白兆麟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本文论述两个问题,一是训诂学具有综合性、实用性、总结性三个特性,二是训诂学要实现现代化需要重视历时与共时、经验与思辨、统一与相对、封闭与开放、定量与定性的五个结合。

[关键词]训诂学;特性;现代化;理论;方法

训诂学作为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后是半个世纪的冷落和三十多年的断裂。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文化事业的复兴,训诂学才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当时,一批在高等院校拥有讲席的学者们,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出于对传统学术的热爱和执著,甘于寂寞,出版论著,努力思索着如何让这门既老又新的学科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

早在1984年,笔者出于同样的思考而出版了《简明训诂学》,^[1]草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训诂学教学体系。在那个时代,由于它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深入浅出,因而在推动训诂学的复兴与普及、培养训诂学专业人才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嗣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训诂学论著,举其要者,论文有《关于训诂方法科学化的思考》、《再论校勘的方法》、《传统“义训”之批判与“引申推义”之提出》、《传统训诂和语义分析》等,^[2]著作有《左传微点注》、^[3]《盐铁论注译》、^[4]《校勘训诂论丛》^[5]等。在上述学术积累的基础上,2005年又向学界奉献一部《新著训诂学引论》。^[6]对这部专著曾有学者给以这样的评价:“这不

作者简介:白兆麟(1937—),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

仅是他多年来训诂学实践与思考的总结,在他本人学术生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在训诂学史上也具有建设意义。因此,从《简明训诂学》到《新著训诂学引论》,不仅反映了白先生个人的学术心路历程,也是二十多年来中国训诂学发展的见证和缩影。”^[7]

如今回顾这三十年来的训诂学研究历程,仍有诸多思考,其中纠结于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训诂学这门学术的特性,二是训诂学学科的现代化。

—

训诂学即古代文献解释之学,这门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最有效的载体。其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即“十三经注疏”,明显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总结性三大特点。为节省篇幅,本文拟简要揭示。

首先,综合性之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象的综合:训诂学研究的对象是从字到句到篇的全部,要把文献的所有信息量全部挖掘出来。即使是某一个难解的字词,也大多是形、音、义的综合探索,不仅解说其静态的概括义,而且要解说其动态的具体义,即字词意义的过去与演变。

其二是方式的综合:训诂学的实践方式大致有两种,即随文释义的传注和通释语义的专著,前者如西汉毛亨《诗故训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唐代李善《文选注》和宋代朱熹《四书集注》,后者如义训汇编的《尔雅》、沟通殊语的《方言》、形训为主的《说文解字》和专用声训的《释名》。这就需要文献注疏和训诂专著的相互配合,两种方式交相发明,彼此推动,相辅相成。

其三是方法的综合:训诂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引申推义三种基本方法,操作时须结合运用,而基本方法又须与一般方法如比较辨析、审视文例、归纳演绎等配合使用;不仅如此,有些言语现象的解释还需要参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诸如民俗学、方言学、甚至天文学、历象学等等。

其次,实用性之特点正如笔者于《新著训诂学引论》第十一章所云,训诂学的任务就在于指导训诂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文阅读、辞书编纂、古文教学、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五个领域。^[8]

说到训诂实践,自两汉至清末,历代随文释义的传注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训诂学实用的特性。

即以诗文阅读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代诗文中某些词语,今人误以为是常用义而未加注解的,可以凭借训诂知识作出必要的解释;二是就今人对某个词语的解释众说纷纭,或者字典辞书对某词注释有众多义项时,可以借助训诂知识来决定取舍;三是今注本如果释义有误,训诂知识可以帮助发现这种错误,并作出正确的解释。

又如辞书编纂,其程序可归纳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辞书的编排和检索、字词的注音和释义、词目的确立和义项的分合等四个步骤。显然,无论哪一个步

骤,训诂学所阐述的知识、经验和规律,都可以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再如古籍整理工作,为了存真求善,就需要辑佚、辨伪、校勘;为了求懂趁浅,就需要标点、注释、今译。以上六项工作,尤其是校勘、标点和注释三项,无不与训诂学密切相关。

最后,总结性之特点,是指历代都有学识丰富的学者站在当时的学术高度,对过去的训诂实践进行一定的归纳与总结,即在一定程度上把往昔的训诂经验提升为带有自觉的理念或比较系统的理论。譬如秦汉时才基本完备的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即是关于上古同义、同类词归并与解释的总结;西汉时扬雄所撰的《方言》是那个时代关于各地方言殊语之间沟通的总记录;东汉时许慎所独创的《说文解字》,不仅归纳了五百四十个汉字部首,而且对九千多个小篆形体进行了结构分析和本义解说;随后刘熙所编撰的《释名》,全面地运用了声训方法,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声训材料;至于宋、清两代札记体的训诂著作,则是关于同义词、同源词的短论与考释等等。

类似以上通释语义的历代训诂学专著均有总结性的创造,因为其中显示着或隐含着学者们所发现的某些规律。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有三点:其一,以往的训诂家大都把语言当成整体来考察,尽管有些是朦胧的、不很自觉的;其二,过去的训诂著述相当注重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因为语境不仅限定词义,而且影响和推动词义的发展;其三,不少训诂大家还注意语义和情貌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词义不仅有词汇义,还有语境义与情貌义(即所谓言外之义)。这里不妨举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古代“门”指院门,是双扇的;而“户”指室门,是单扇的。此外还有何区别?《说文解字》云:“门,闻也。”“户,护也。”^[9]这种声训方式即暗示读者:“门”含有传达作用,而“户”具有保护作用。个中所揭示的语境义和情貌义,显然是西方语义学所不能相比的。这正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训诂学的特性所在。

二

然而,我们的训诂学毕竟古老而年轻,还需要与现代接轨,以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那么,应当从何入手呢?笔者以为当从方法论着眼。整整二十年前,笔者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训诂方法科学化的思考》的论文。该文曾经从哲学认识的高度强调三点:第一,严格区分训诂方法与训诂方式;第二,要区分训诂的基本方法与一般方法;第三,在训诂的基本方法中须以“引申推义”取代“直陈词义”,以便与“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相应而构成一个基本方法的子系统。^[10]

经过二十年的多次思考之后,当是进一步论述训诂学现代化的问题了。就方法论而言,为达此目的,笔者以为务须注意以下几个结合:历时与共时、经验与思辨、统一与相对、封闭与开放、定量与定性。

其一,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历时”和“共时”这两个概念,最先是由世界科学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应该区分共时

的(研究“同时发生的”)观点和历时的(研究“不同时间的”即在时间上连续发生的)观点。用索绪尔的话来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和历时分别表示一种语言的状态和一种进化的情况。”^[11]

这也就是说,对语言现象既有纵向的分析,也有横向的分析。譬如词义的引申会产生一个个新义,这在时间上是连续发生的,属于历时的纵向分析;而当演变为新词时,这一刀从哪儿切开,那就需要共时的横向分析。又譬如鉴别《尔雅》里的被释词,哪些属于“不同时间的”古今词,哪些又属于“同时发生的”方言词,就需要对语词在文献里的使用进行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考察。

其二,经验与思辨的结合。语言科学的研究手段历来主要是实证的、归纳的。而哲学一般是思辨的,要用逻辑来推想。其实,科学研究的进展告诉我们,语言研究也应当运用思辨的能动性。譬如,词义的引申是突变还是渐变?在渐变中有无中断?通过思辨可以推想,引申不只是渐变,而是渐变与突变的相互结合。又如,老一辈语法学家所提出的“例不十,法不立”这条原则,对现代汉语完全适用,而对古代汉语的研究却不一定如此,有时孤证也有可能反映新的规律。在语言激变的时期,孤证有可能是宝贵的证据。再如,词义的引申并非单个系列的,它可以带动其他相关的词,即多个同步引申。这就是类推的作用,就语言的使用者而言,也是联想(通感)作用的结果。例如:

- “族(箭头)”——箭多——多(“族庖”);
- “众(人多)”——人多——多;
- “庶(屋下人众)”——人多——多(“庶民”);
- “列(分裂)”——物多——多(列观、行列、队列)。

以上四个词相互影响,都是“由个别到一般”的引申规律在起作用,这种推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其三,统一与相对的结合。这是指语言规律的普遍性与非普遍性。从哲学角度来说,任何规律的覆盖面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就语言学来说,语言交际虽然具有社会性,而言语行为却具有个体性即非普遍性。譬如字词的“形音义统一”是条规律,而音同或音近的假借即形与义并不统一。又如传统训诂著作中常用“某某声”“某某貌”“某某义”,就是用的模糊言语来解释字词,这是符合语言的客观实际的。如果解释精确,反而失之于凿;反过来,该用精确解释的而解释模糊,即失之于泛。再如词义引申,古今是否一样?一般词汇学论著在术语、方法上都一样,这是否符合事实?词义引申的规律未必古今统一,按理也应当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其四,封闭与开放的结合。所谓封闭,指的是研究一部文献,仅仅着眼于那部文献里本民族的语言材料;所谓开放,指的是那部文献可能所受影响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如果顾此失彼,其研究成果必然大打折扣。训诂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其本身就是开放的,不应当把它局限于词义学,那倒是封闭的。上面曾

经提到的《方言》这部西汉文献,其中就记载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譬如其卷一中说“知、晓”也叫“党”,^[12]这个“党”是记音字(即“懂”)。训诂学要实现现代化,就应当自觉地吸收西方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只有有意识地汲取外界新鲜的东西,训诂学才能有所突破。

其五,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往昔的训诂实践一般都是定性分析,而且大多是权威性的、指示性的。这是第一阶段。其后是描写性的,例如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名著《五经正义》。这是第二阶段。再后是分析性的,例如清儒对训诂原因的指明,诸如“对文、假借、同源”等。这是第三阶段。总的说来,都属于定性分析,而极少定量分析。

说到定量分析,明末清初的一代宗师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六》里有一段难得的珍贵记载:“《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言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已。”可惜凤毛麟角,影响不大,即使到了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王念孙、段玉裁也只是偶尔提到“经传无此例”、“某传凡六见”等,如此而已,远未达到自觉的程度。

相对来说,定性分析易带随意性,而定量分析却比较客观。例如“军”字,经统计《左传》中用得最多的是动词“驻扎”,而后人的语感往往不可靠。定量分析即能鉴别出所定性的真伪。到了近代,西方统计语言学传入我国,前辈学者们才真正自觉而又普遍地把数理统计方法作为研究语言文字的一种辅助手段,对语言、训诂等方面的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并由此作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总而言之,训诂学要实现现代化,无非是在理论和方法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要注重理论的先导作用。世界理论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13]这段名言给我们以启迪: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不同的人在做着相同的实践,却未必能得到相同的体验,这取决于他们的理论背景。对一个专业研究者说来,某种理论背景不仅是一种认识能力或者认识水平,而且是其主体的存在状态,即超越日常利害制约的生存境界。

大凡学术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发现研究线索,把握其中的意义与价值,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而观察力来自事先要有“思想准备”,也就是通过阅读而日积月累的“理论背景”,如此方能“灵机一动”,即激发想象,由一种好奇心而突然想起某个新的观念。人们常说研究者要具有“思辨能力”。何谓“思辨能力”?根据笔者的体会,其核心是理论素养加上逻辑修养。理论是观察与思考的导向,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柢,再观察也发现不了问题。具体到训诂学,研究者首先要具备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根柢,其次要有相关学科的理论素养,再次要有学术发展史的知识准备。三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要注意方法的层次区分。笔者于1996年撰写《训诂学教程》时,曾经有意识地思考过方法论的问题。后来更为明确地提出,作为方法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最高的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譬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单元论或多元论等,既是根本观点,也是基本方法,具有统摄和指导的作用;其次是逻辑层面的方法,或者说一般的方法,譬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分类法、统计法等,这是各门学科都能使用的方法;再次是所谓学科层面的方法,或者说专门的方法,即一般只适用于某门学科的方法,譬如情节分析法、人物性格分析法、人物心理分析法、形象分析法等,只运用于文学,尤其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而音素分析法、音位分析法、声韵分析法等,仅适用于实验语音学与音韵学,至于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一般适用于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等等。^[14]

因此,在运用某个方法时,要了解该方法的特点与适用性。譬如前面所说的归纳和演绎,是两种十分重要的逻辑推理方法,但在认识与研究客观对象的过程中,它们各有特定的作用与地位。别的不说,推理的起步需要有资料,对资料就有必要加以斟酌,分清其价值的大小、主次与新旧,对过去的资料还要考虑是否可用于将来。就此一端也说明了,只有对事物与现象作全面而系统的观察和分析,应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起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于1873年为《资本论》第一卷再版时所写的跋语:“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说得多么明确啊,始而“占有材料”,继而“分析、探寻”其“内在联系”,终而呈现出“先验的结构”。这才是获得理论修养、进入研究领域的必由之路。

注释:

- [1]白兆麟:《简明训诂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
- [2]参见《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白兆麟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
- [3]《左传微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 [4]《盐铁论译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 [5]《校勘训诂论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 [6]《新著训诂学引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 [7]阚绪良:《从〈简明训诂学〉到〈新著训诂学引论〉》,《中文》(香港)2006年第一辑。
- [8][14]白兆麟:《新著训诂学引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75-279、119页。
- [9]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10]白兆麟:《关于训诂方法科学化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 [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9页。
- [12]扬雄:《方言》,参见钱绎:《方言笺疏·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页。
- [1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1页。

[责任编辑:黎虹]